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XIANDAISHEHUIXUEBIJIAOYANJIUCONGSHU

文学社会学

——罗·埃斯卡皮文论选

(法) 罗贝尔·埃斯卡皮 著
于沛 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文学社会学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 著
于沛 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排版
(杭州莫干山路良化站)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3 字数 205 000 印数 00 001—16 95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103·264

定 价：2.05元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编委

顾问：陈一咨 田森

主编：何维凌

副主编：黄晓京 王文仲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晓琳 王文仲 白南风 朱竹

杜岩 李路路 何维凌 杨小东

郭亚夫 陶德荣 谢文 黄晓京

封面设计：王义钢

编 者 的 话

社会学，几年前还只是刚刚“复活”的新学科，如今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进入了酝酿着重大突破和发展的新阶段。

我国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或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或计划；学术界在讨论多学科研究时，也把社会学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更使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或非经济因素对改革成败的重大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西方社会学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无不呈现出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互相融合的趋向，并且学科本身也在现实研究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比较借鉴。

社会生活的实际要求推动着社会学的进步。

正是现实的推动，读者的需求和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热情扶持，才使我们有勇气编辑这套《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

这里的“比较”，就是借鉴；“比较研究丛书”是借鉴的窗口。通过这套系列丛书，将把经过选择的外国社会学著作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让人们评头品足，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一步开拓思维空

间，加强中外学术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以中青年社会学工作者为主体，在“现代社会学丛书编委会”指导下开展工作。

在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各学科丛书林立的今天，《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还是破土新芽，显得有些稚气。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成为丛书的批评家和赞助人，使这套稚气的丛书迅速成熟起来，成为我们大家的读书园地，并为推进新时期的社会学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这一切都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

1985年6月于北京

译序

这本集子选译了法国波尔多文学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物罗贝尔·埃斯卡皮的主要论著。我们选译此集子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近年来学术大繁荣，知识体系迅速更新的大背景下，各门学科都开始打破或已经打破了原先囿于一隅、孤芳自赏的格局，形成开放和开发型的体系，魅力朝时代提出的要求——高度综合的知识结构奋进。知识界、理论界的不少学人，包括作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社会学家等，亦不甘寂寞，试图在传统文艺学和社会学的交界处有所突破；近年来文艺学领域中的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社会学研究恢复后的迅猛发展所起到的强大推动作用，使得这一尝试初见成效；于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社会学学说崭露头角，并在观察、研究、处理文艺社会现象和文艺社会问题时显示出日渐旺盛的生命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我们创立并逐渐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社会学理论体系时，置于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介绍、引进和研究国外文艺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针，对国外文艺社会学研究中的优秀成果进行条分缕析，摒弃糟粕，撷取精华，才能更

有效地促进国内文艺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早日完善我们自己的文艺社会学。

其次，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学说在西方文艺社会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同我国相比，国外文艺社会学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在它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之前，西方的文学史和美学史上就出现了早期的文艺社会学思想，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有关文艺社会关系和文艺社会作用的论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还产生有较为幼稚的文艺社会学学说，如德国的赫尔德，法国的狄德罗，俄国的普希金等。学者们一般将法国的斯达尔夫人视为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始祖，指出她写于1800年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这一专著标志着文学社会学的产生。斯达尔夫人之后，特别是在法国学者孔德于19世纪30年代开创了社会学以后，欧洲各国（尤以法国、德国、俄国为甚）开始出现了一些较为系统的文艺社会学理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长足进展并日趋细密：其研究领域获得前所未有的拓展，各种方法和学说观点林林总总，有影响的学派工力悉敌，独树一帜的学者各领风骚，专门化的学术专著纷呈林立，一时蔚为壮观。特别是60年代以来，国外文艺社会学研究普遍开始积极汲取其他学科及众多文艺批评流派的理论建树，比如行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语言学、语义符号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接受美学等等，推出一批更加启人心智的优秀成果。而罗贝尔·埃斯卡皮及其学说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埃斯卡皮生于1910年，早年攻读英国文学并取得博

士学位。他在比较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了解，并列举其中一些事实作为其立论的根据）。在当代，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已不得不将一国、一地区、一民族的或数国、数地区、数民族的文艺现象，放到世界文学的大背景和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这样一个大系统中去考察，埃斯卡皮就是这样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就其研究方法和对象来讲）亦是一种比较文学。埃斯卡皮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会长，现任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法国《比较文学》杂志编委、法国波尔多大学文学系主任，领导着法国波尔多文艺社会学学派的研究中心——波尔多文学和大众艺术技术研究所。

埃斯卡皮著述甚丰，早年以小说创作步入文坛，后转向文艺理论、社会学、传播学等研究，从1948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二部著作问世。他写的《文学社会学》(1958)开创了法国当代文艺社会学研究，加上《书籍的革命》(1965)和他编纂的《文学性和社会性》(1970)两部著作，同为法国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也集中反映出他的文学社会学学说中的精髓。

本书根据编者目前手头掌握的资料精选，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埃斯卡皮的学术观点，其中一至四部分选自《文学社会学》，五至十部分选自《文学性和社会性》；十一部分《文学史的历史》是埃斯卡皮写于1978年的论文。我们将他的这些文论按发表年代编排，也是期望读者能见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为有助于更好地借鉴，附上了《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评介》一文。

本书选定后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

授徐和瑾同志、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王美华同志鼎力相助，承担了部分译文的翻译，所以是通力合作、集体劳动的结晶，此书终以现在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们期待中肯的评判。在此，还要特别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王晴波同志，在此书的选编过程中，她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于 沛

1986年秋记于沪上寄寓

目 录

一 文学社会学的原则与方法 王美华译(1)

- | | |
|-------------------|--------|
| 1. 文学与社会 | (1) |
| 2. 制定一项图书政策 | (2) |
| 3. 书籍、读物、文学 | (4) |
| 4. 接触的途径 | (10) |

二 文学生产 王美华译(15)

- | | |
|------------------|--------|
| 1. 作家身上的变化 | (15) |
| 2. 世代与群体 | (19) |
| 3. 出身 | (25) |
| 4. 资助问题 | (31) |

三 文学的发表与发行 于沛译(36)

- | | |
|------------------|--------|
| 1. 发表与创作 | (36) |
| 2. 历史的发展 | (38) |
| 3. 出版职能 | (42) |
| 4. 发行圈子的界限 | (50) |
| 5. 文人的圈子 | (54) |
| 6. 大众的圈子 | (62) |

7. 障碍的消除者 (67)

四 文学的消费与阅读 王美华译 (75)

1. 广大读者 (75)
2. 行家与消费者 (85)
3. 动机 (89)
4. 阅读情况 (93)

五 关于波尔多文学社会学学派 于沛译 (98)

六 文学性和社会性 于沛译 (102)

1. 文学的种种限囿 (102)
2. 文学的特性 (105)
3. 作为交际的文学 (112)
4. 社会性插入文学性之中 (124)
5. 研究领域和方法 (134)

七 文学的成功和寿命 徐和瑾译 (138)

1. 商业上的成功 (138)
2. 作家的成功 (147)
3. 作品的寿命 (159)

八 文学和发展 于沛译 (175)

1. 发展和文化控制 (175)
2. 阅读不足和文盲 (178)
3. 文学的大众化 (181)

九 “文学”这一术语的定义 于沛译(189)

1. 从词源上探讨 (189)
2. 语义研究 (190)
3. 语言上相等的字 (194)
4. 历史的述评 (196)

十 书是什么? 于沛译(206)

十一 文学史的历史 于沛译(208)

1. 浪漫主义时代 (208)
2. 十九世纪 (213)
3. 有关文学的科学 (229)
4. 现当代文学诸问题 (236)

附：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评介 于沛(247)

文学社会学的原则与方法

1. 文学与社会

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

在这种圈子的各个关节点上都提出不同的问题：创作者提出各种心理、伦理及哲学的阐释问题；作为中介的作品，提出美学、文体、语言、技巧等方面的问题；最后，某种读者集体的存在又提出历史、政治、社会，甚至经济范畴的问题。换言之，至少有三千种考察文学事实的方法。

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这三个世界的情况，给研究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尤其当我们必须为它编写一部历史时，这种三维现象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在几个世纪里，而且直到现在，文学史还是过多地局限在研究人和作品（风趣的作家生平及文本评注）上，而把集体背景看作是一种装饰和点缀，留给政治编年史作为趣闻轶事的材料。

真正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明显地被忽略了，即使在按照传统方法编写得最好的文学史教材中也是如此。有时候，作者意识到了社会维数，并试图加以描述，可是，由于缺乏严谨的、专门的方法，因而他们还是经常当了人与作品这个传统框架的俘虏。历史的深度仿佛在一块两维屏幕上被压扁了；文学事实因此受到扭曲，就同一张世界地图在平面投影上的失真情况一模一样。这也跟下面两个现象很相似：在小学生的地球仪上，错误地把阿拉斯加画得幅员辽阔，使下面的墨西哥显得很小很小；十七世纪时，凡尔赛宫中十二个或十五个年头胜过法国六十年的文学生活。

这些困难永远也无法全部克服。全面地描述，诚然不可能做到，但根本的是，文学的探索者们——传记作者或注释家、文学史家或评论家，对目前的或过去的文学事实都要有一个全面的不走样的观点。在了解作家的时候，下面这一点不能等闲视之：写作，在今天是一种经济体制范围内的职业，或者至少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而经济体制对创作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在理解作品的时候，下面一点也是要考虑的：书籍是一种工业品，由商品部门分配，因此，受到供求法则的支配。总而言之，必须看到文学无可争辩地是图书出版业的“生产”部门，而阅读则是图书出版业的“消费”部门。

2. 制定一项图书政策

以前只要求个体智慧，要求认识自身，现在则要求集体智慧。然而，在文学方面，对自身缺乏认识似乎是各个社会的通病。一百多年前，广大人民群众开始觉醒，要求提高社会地位；到了我们这一代，则已成了不容回避、必须正视的现实。

人民群众的要求促使人们从物质方面去进行考虑。而对文化方面却重视不够。尽管人们经常谈到文化方面，但是，在大众文化这个概念上，到处都有传教士的、家长式的思想在作怪；实质上，这是束手无策的表现。跟地质上中生代的小头蜥蜴一样，在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懂文学的只不过千把人。

负责制定社会政策的部门对这一情况深感忧虑，也就不足为怪。家庭补助金保管局全国联合会机关刊物《社会信息》于1957年1月份出了一期专刊，集中报道就“文学与广大读者”为题广泛进行调查的情况。这次调查几乎涉及文学社会学关心的所有问题。这一期刊物可视作向系统研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①

该期杂志有一篇吉尔贝·穆里先生的文章，题为《有可能建立一门书籍社会学吗？》他以宗教社会学为例，提出应当有一门文学社会学。

不久以前，所有对信念及宗教信仰进行的客观研究还被一些才子看作是试图违背神秘主义。然而今天，天主教主教团却发起大规模的调查，以期使主教们的活动能适应现实情况的要求。……可以肯定，从作家到书商，这些搞图书的人在看到对他们的读者进行系统的研究，在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反映，从而更明确跟他们建立联系的办法之后，定然得益非浅。^②

吉尔贝·穆里先生非常及时地提醒我们商人 在缪斯神庙中的位置：由于文学离不开为宗教所不屑一顾的经济问题，因而就更应当面向社会学。把文学认识清楚，这不仅仅出于写作

① 应《社会信息》杂志主编、这次调查的发起人勒内·蒙热先生之请求，我把调查获得的一系列价值不等的“见证”加以调整，并就结果加以评论。

② 见1957年1月的《社会信息》第64页。

活动的需要，而且也是一宗好买卖。当然，我们不能就只着眼于商业的考虑。狄德罗在《有关书店里的买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发现那些让一般准则左右着的人们常犯的差错，是把办织布厂的原则应用到具体一本书的发行工作上。”

文学社会学应当尊重文学事实的特殊性。这门学科对内行人是好买卖，对读者也应当是一宗好买卖，它可以帮助传统的文学科学——历史的或评论的——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从间接方面来说，也是文学社会学自己的任务：它的作用仅是从社会范围内来考虑这些问题。

这一计划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分析工作；任何个人、甚至孤立的小组都无法单独完成。在本书1958年出版的第一版中，我只能就提出的极少数问题，提供研究的结果。但是，这已经使我跟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建立了联系，也激发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兴趣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1971年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会在波尔多召开大会，讨论**文学与社会**这一专题；象这样的会议说明，大学里的文学专家们正在愈来愈自觉地采用社会学的观点。

1959年在波尔多建立了“文学事实社会学研究中心”，隶属于“文学与群众艺术技术研究所”。象这一类机构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在布鲁塞尔，由L·戈德曼提议，在伯明翰，由R·霍格特提议，还有其他许多地方——美洲、西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流派都纷纷成立研究中心。在大学里设置文学社会学课程，这在1958年还是个计划，今天却正在变成现实。

3. 书籍、读物、文学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文学事实，有三个重要形态：书籍、读物、文学。在普通的话语中，这三个词往往可以互换；事实

上，这三个概念只有部分相交，其界限又非常模糊。

给书籍下定义，是件相当棘手的事。目前唯一可算是完整的定义也十分含混，不能实际使用：“在一定大小的某种材料上，用符号表达某类知识，并制成某种卷册者。”^①《利特雷法语词典》在一条物质性定义——“订在一起的几叠手写或印刷页面折成的书帖”——与一条半知识性定义——“用散文或诗句写成的精神著作，具有至少能构成一册的足够长度”——之间犹豫不决。如果我们查阅一下“册”这个字的定义的话，那是指“一本装订或精装成册的著作。”这一提法也无济于事。

其实，没有一条有关书籍的定义。每个国家、每个行政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一条或几条定义。在法国，只有财政部有两条定义，一条供海关使用，一条供税务机关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的全会要求各国采纳一条统计学的定义：“非定期的、49页以上的出版物。”加拿大、芬兰、挪威的法令采纳了49页。黎巴嫩和南非需要加上1页。丹麦要求60页，匈牙利64页，爱尔兰、意大利、摩纳哥是100页！相反，比利时满足于40页，捷克斯洛伐克32页，冰岛17页。至于印度，把很薄很薄的小册子也归入书籍一类！联合王国的定义则从财源考虑：凡价格在六便士以上的出版物均作书籍论。^②

以上各种定义的错误在于，它们都把书籍看成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不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按照不少定义，火车时刻表也归入书籍一类，而拉辛、莫里哀的一出剧本却因为用教学版本，而不能算是书籍。如果说，某些定义考虑到了书籍的内容，但令人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定义考虑这类书籍的用

^① 这是保尔·奥特莱下的定义。由E·德·格劳利埃引用在他的《书籍的历史》一书中。《我知道什么？》丛书，第620页。

^② 见R·E·巴克的《把书送到每个人的手里》第17页。